



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

Distr.
LIMITED

TD/L.363
12 February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十届会议

泰国，曼谷

2000年2月12日至19日

贸发会议秘书长
鲁本斯·里库佩罗的开幕词

柏林墙倒塌后不久，有人问哲学家伊曼纽尔·莱文纳斯，他是否认为民主国家取得了胜利。“不”，他说，“我认为它们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尽管有着所有那些恐怖和无度，共产主义一向有着希望和期待。希望将有可能改变弱者受到的欺凌，期待较为公平的社会秩序。共产党人并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他们也并不是在为之作准备。事情恰恰相反。但是，所存在的是一种思想，认为历史有意义，有方向，生活并不是盲目和荒谬的。这是西方人民自十八世纪以来就有的思想，由于马克思的功绩，这种思想在二十世纪牢固地扎下了根基。我并不认为永远失去这种思想就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胜利。直到昨天，我们都知道历史的走向和我们应当赋予时代的价值。而现在，我们却在盲目徘徊，失去方向，不时地问我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时候？’在俄罗斯，有些人多少以一种宿命论的味道不断地问：‘现在是什么时候？’不再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莱文纳斯这段精彩的论述是一个好的起点。其中包含着三种基本思想。第一是历史，也就是说，前进着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方向，必须使政治和经济有某种意义。第二，这种方向感只能产生于克服贫困和匮乏，产生于建设一个较为美好的世界。第三，我们必须在此和现在就开始环视四周，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在哪里？我们想到什么地方去？现在是什么时候？”

现在是一个新世纪的黎明，第三个千年的起始。我们正处在伟大而古老的亚洲大陆——人类大多数的家园——的中心：这是自日本经济崛起之后又出现了包括泰国在内的十几个成功典范的地方，是证明发展并不是无法实现的梦想的唯一地区。不过，我们也身处曼谷，在不到三年以前，这里曾经是威胁着摧毁三十年之间取得的成就的一场金融地震的震中。

亚洲现在已经摆脱了危机，生机勃勃地回到了世界舞台之上。亚洲是通过弹性活力、吃苦耐劳及国际社会给予的合作取得这一成绩的。亚洲这些开拓业绩背后的种种优良作法今天与以前一样有效：高储蓄率、健康的宏观经济、投资于人力资源、出口导向、公私部门伙伴关系。这些是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核心，是我们所有人可能都同意的最起码标准。但是，金融市场近年来的大规模失败表明，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在发展中国家内，受到这一失败打击最重的倒不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反而是其中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恰恰是那些在上述素质方面占有优势的国家。应该承认，这些国家本来可以更多地改进规章，加强银行监管，杜绝政治裙带关系等等。然而，难道这样就能使它们免受感染的痛苦吗？从我们在此类问题的表现较不明显的某些经济体(例如香港)中看到的一切来判断，这是最值得怀疑的。这些经济体也不得不付出了产出损失和失业的沉重代价。

事实上我们得到了一个痛苦的教训：发展取得进步不一定会降低面对外来冲击的脆弱性。它可能会使痛苦少一些，磨难短一些，但却提供不了百分之百的保护。其中的原因与使亚洲的发展成为可能的原因相同：与全球经济接轨。由于接轨，有些亚洲国家通过向临近地区和全球市场出口而取得了增长。但是，也是接轨，这些国家成了金融市场所谓“羊群行为”怪异多变的受害者。米歇尔·康德苏斯在里昂七国集团会议之前说过，二十一世纪是以墨西哥危机开始的，这场危机表明，国家

决策和全球后果以及相应颠倒的全球决策和国家后果是如何的相互交织，不可分割。事情全让他说到了。

换言之，相互依存是无可改变的，向两个方向发生作用，一个方向是更好，另一个方向是更坏。不过，有些人的相互依存程度大于其他人，因为他们是弱者，较为脆弱，需要更多的保护。

这就是我对“在此和现在”的理解，这是我们今天聚会的直接背景。现在是对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进行彻底和深入思考的恰当时机。这首先应当是一次评估：什么是对的，什么出了毛病，原因哪里？第二，原有方法的重点是资本积累，提高生产力，开展贸易而不是援助，我们应当探索的是，这种方法中少了些什么。有些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环境及其对发展的可持续性的决定作用、增长的质量、收入分配、减贫、妇女的作用、体制建设、人类发展。在一种新的综合方法、一种新的范式中，必须把某些方面纳入进去。第三，什么是面前的挑战？制服短期资本不稳，摆脱对少数商品的依赖而扩大供应基础，在发展对知识的依赖超过其他因素的时代引进技术，可能每个人都会想到这些，但肯定还有更多。

各位会注意到，我省略了那些极端的互为排斥的二重因素，如国家与市场、价格稳定与经济扩张、要劳力灵活性还是要保护就业、干预主义与自由企业、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是对外接轨还是闭关自守。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相信这是些不该问的问题，从概念上早就解决了。我们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重复过去的战斗上，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应付当前的实际挑战，注重事实和实验证明，而不注重意识形态。除其他外，我们应当努力以互为增强、较为连贯的方式使经典二重因素的种种内容协调统一，相互兼容。

在这里，连贯是关键：外部经济环境与国内政策的连贯，而且还要有每一对矛盾内部的连贯。在这方面，东南亚可以成为一项个案研究的专题。始于金融部门的一个问题很快蔓延到了货币，然后拖垮了全世界的贸易市场。如果执行了能够帮助受影响国家通过出口恢复过来，把进口需求保持在高水平的政策，而不是迫使这些国家压制进口，当时有可能解决那些金融和货币问题吗？或者用一种略有不同的方式说，当时有可能执行使金融、货币和贸易相互之间较为连贯的政策吗？

显然这也适用于国内政策，不仅在货币和财政问题上，而且也在尽可能广义的社会政策方面。高效率 and 廉洁的政府，人权和社会权利，对人才资源、教育和卫生、

有益健康的环境的大量投资，所有这些都是任何有实际意义和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发展中世界的公民并不反对这个思想。实际情况是，有时这些目标被当成了政治工具，或被有偏向和选择地用来歧视或提出不合理的条件。但它们并不因为这种情况而不那么可取或具有决定意义。毕竟，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发展，正是为了能够享受这些好处。而如果全球化具有一种深层意义的话，那么它应在于对民主和人权价值普遍性的认识上，认识到那些价值并非属于某种文化或某些国家，而是构成了世界道德观念的基础，主张不同文化、宗教、文明之间的对话、谅解和合作，而不是冲突、对抗和不容忍。

尽管这是一条真理，但这个世界仍然是一个差异很大、不平衡的地方。各国在试图取得一致和促进普遍理想的同时，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彼此相距千里。在力求弄清应如何实现发展时，人们不应忽视各种条件的极大差异和资产不平等的情况。复杂性是发展的关键所在，必需讲究灵活性、循序渐进、适应能力、政策和方法的多样性，以及适当地安排改革的顺序。因此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处方，绝无差错或教条主义的模式或一致意见。意大利共和国的开国之父德加斯佩里曾说过，不是政治需要耐心，而是政治就是耐心。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发展就是耐心。

实际上确是如此。但发展也是同舟共济。在实现一致、效率、竞争的共同斗争中，将既有获胜者，也会有失败者，不仅是在个人和公司之间，而且也包括国家、地区乃至整个大陆。例如，非洲和 48 个最不发达国家，或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33 个最不发达国家在非洲——很有可能在这场游戏中成为彻底的失败者。我们是否有道义上有权对它们的困境保持无动于衷呢？当然出现这种状况有其局部的原因，有些是人的不足，有些带有客观的、地缘的性质。但我们是否就可以说，我们对这种情况就没有责任呢？是否由于我们的自私和无动于衷，就应该让数百万兄弟姐妹受此“无声无息的绝望生活呢”？

有人仍然坚持，要使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应开辟良好的竞争条件，完全取消歪曲价格的机制，建立人人平等的机会。但不同的人民和国家，他们的起点相距千里。在这种情况下，平等有多少真实性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承认，竞争的游戏如同在所有游戏中一样，不仅需要有明确的规则和公平的裁判，而且还需要经过训练、准备呢？难道这不是有些国家对它们长期处于被剥夺、处境不利的少数群体所做的吗？它们的“扶持行动”方案，目的不在于假设的平等，而是实际上的平等，向穷

人，也就是不平等的一方提供具体的、有差别的机会，学会如何竞争，如何生产，如何交易。这是一项需要耐心的工作，很可能需要几代人，如克林顿总统和其他世界领导人所敦促的那样，需要大规模的、协调一致的努力，发展能力和机构建设。这是一项挑战，但是是一个值得作出的努力，它将使我们更加接近实现马丁·路德·金博士为我们提出的崇高标准，他在伯明翰写到：“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公正的威胁”。

顺便说一句，这正是同舟共济的完整意义。当然，它产生于最基本的人类团结——为全球的环境、为人权，但也为战胜贫困和排斥现象分担责任唯一可能的基础。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想到的也正是这一点，她说，在我们制止种族灭绝之前，不可能有真正的全球化。道德上的必须，道义上对弱者和易受害者的承诺，还不是这个概念的全部内容。同舟共济的意义也包括纯粹经济的、客观的方式，它也是一个自身利益的问题。

正因如此，我们在贸发会议从来不单独地讲全球化而不立即加上“和相互依存”。

有一派骄横的全球化主张，单纯地强调没有任何束缚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资本的力量，它所关心的只是寻求利润。相反，相互依存强调共同利益，双赢局面。它要求重视在国内企业与它的工人和当地社区之间的联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在国际上商品的供应国和进口国，有高速增长潜力的新兴经济与提供资本和技术的成熟经济之间的联系。

贸发会议从一开始便强调了三个中心思想。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取决于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进口需求，反之亦然。第二，新兴经济只有在得到外国资金、投资和技术的补充并使本国资源得到大大发展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它们的全部增长潜力。第三，贸易是造成发展良性循环的最佳手段，但要实现这个作用，它还必须积极促进增加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务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条件。

1964年，普雷比什博士在第一次贸发大会的发言中曾详细地讲到所谓的“贸易差距”，用他的话说，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的资本货物和其他货物的进口，大大超过用它们目前的出口收入能够支付的水平”。如果那些国家要达到联合国为该十年确定的最低5%的年收入增长率——他认为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指标，一旦提高这个增长率的必要条件成熟，便必须超过这个速度”——到1970年这个差距是200亿美元。普雷比什博士说，这个差距意味着，有价值200亿美元的资本货物不能出口，

即经济先进国家的工业失去了很有希望的出口机会。按今天的美元计算，这笔钱相当于 2,000 亿美元。

去年贸发会议的《贸易和发展报告》又重提了这个思想。该报告发现，尽管取得了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的成果，9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贸易赤字较 70 年代又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个百分点，而经济增长则降低了两个百分点。很多国家非但没有达到或超过 5% 的增长指标，甚至也没有达到该十年 3% 的年增长率。例如拉丁美洲便是这种情况，在这段时间里，拉丁美洲的贸易赤字增加，大约 4%。

当然也有一些光明的例外，其中很多是在亚洲，而总的不良表现原因也各有不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 and 进口需求增长迟缓，起了重要作用。同样，商品价格下跌和贸易条件恶化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另外，还有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选择失当。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责任应归咎于贸易自由化发展的不平衡。明显对全球化耿耿于怀的一个人，即普林斯顿大学的哈罗德·詹姆斯教授在 12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出版物中写道，由于蓄意选择将农业、纺织和制衣业排除在外而使贸易体系得以成功。当然，人们可对这一点进行辩论，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下述事实，即在建立三年后，该体系迄今未能完全应付将这两个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关键的部门纳入其中的需求。

许多年来，贸发会议几乎是大声疾呼问题的唯一一个声音。但是，现在我们获得了各方的支持，对此我们感到安慰。联合王国发展合作国务秘书克莱尔·肖特女士要求发起一个“发展回合”，迈克·摩尔先生在 77 国集团和中国的马拉喀什部长级会议期间也强有力地谈到了这一点。克林顿总统在达沃斯以及帕斯卡尔·拉米先生在布鲁塞尔均谈到了这一点。在 1 月 11 日的牛津饥谨救济委员会的吉尔伯特·穆莱讲座上，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先生指出，“贸易谈判的试金石是发展中国家是否能从中获益”。他接着指出，为了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获得进展，它必须反映“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意见，并使它们能够充分参与讨论并对最终协定拥有发言权”。

如果不是意识到要把这些讲话变成行动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我本来完全可以高枕无忧。在执行这一任务时，贸发会议的作用是明确无疑的。作为一个以知识为本和建立共识的组织，贸发会议应当协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体制，并发展制订总的贸易、投资和经济政策的技能，成功地与其合作方进行谈判并从谈判得来的机遇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是由秘书处进行认真一流的分析研究并通过与外部专家进行讨论和与类似的国际组织进行交流而加以不断补充和完善。这将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达成共识铺平道路，并为实际执行提供基础，无论它是通过贸易谈判的积极议程、商业外交、投资培训计划等方案，还是通过在与贸易、投资和相关问题的所有领域中开展国家或区域能力建设项目。

但是，当你不具备谈判的基础时，光能够有效地进行谈判是不够的。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很可能是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也许并不完全是市场准入，也可能有供应问题。如果一个国家依赖于用咖啡、可可或石油来赚取该国 70% 的外汇(仅非洲就有 45 个以上的国家处于这种情况)，那么它就必须不仅只看到贸易谈判，因为这种谈判并不能解决它们的供应问题。如何扩大生产基础、如何能够在市场上提供各种不同的商品和服务，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技术援助，更需要持久的国家和外国投资、技术和企业技能。

在我引述的同一篇发言中，普莱比什博士预言：“我认为，总有一天一个范围更大、具有目前似乎还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某些超国家权力的一个国际(贸易)组织终将出现”。

当世界贸易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诞生时，这一点终于得到了应验。发展中国家已经意识到它们在捍卫一个以一项制度而不是以一项临时适用的合同为基础的按规则行事的多边体制时的利益。当然，世界贸易组织并未充分具备 Prebisch 所想象的所有特点。最为理想的是，这样一个组织应当向各国提供一种法制的把握和保证，同时使各国能够公平及平衡地分享这一体系的利益，以便能够消除造成贫富悬殊的鸿沟。

要使所有这些领域都发生改观，肯定还大有余地。贸发组织作为肩负通过贸易促进发展的职责的联合国大会的机构，在这方面应当发挥理所应当的作用。这项任务必须由所有国家携手完成，不能够在一个只有在梦想中存在的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的替代性的体系中开展这一工作，而必须从一个现有的、现实的与我们所有人类和机制一样总是存在不足但又总可加以完善的体系的内部来完成这一任务。

保罗·蒂里希写道，古希腊——罗马帝国崩溃时处于死亡和毁灭的痛苦之中，中世纪结束时则身怀道德愧疚的痛苦，但与此恰恰相反，我们的世界在结束时则将陷入精神虚无颓废的痛苦之中。

确实，在一个世纪开始和一个千年降临时，人们对全球化及其对所有人类价值以及对可能享有的富足和有意义的生活所具有的可察觉的威胁怀有深深的不安和极度的痛苦。也许这与极端性政治运动即使在没有被认为造成它们在三十年代首次出现时的历史原因的情况下卷土重来有一定关系。

必须解决人类社会的这些恐惧和忧虑，并且必须开始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地心怀不安的人们进行系统的、有组织的对话。我们应当从法国革命前夕人们表述其要求的抱怨书《陈情书》中寻找灵感。但是，现在我们应当要求获得载有希望和抱负的《希望之书》。我们要的不是空想世界，我们应当记住 Alexander Herzen 的一句名言：“无限遥远的目标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骗局；一个目标必须近可触及，最起码应当是工人的工资或工作的快乐”。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在本次曼谷会议上携手开展的工作：使亚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世界最贫困地区的普通百姓具有现实、可信和实际的理由对未来寄予希望，希望未来将比乌邦托的坟墓和我们抛弃的幻想更为美好。

-- -- -- -- --